



约翰·道格拉斯 著

张琰/吴家恒/刘婉俐 译

破案之神

——FBI特级重犯追缉实录——

美国联邦调查局有一个最神秘的专家小组，

是专门调查及连续搜集犯作资料归集、建立档案，

并进行研究分析的单位。

作者之一的约翰·道格拉斯曾长期担任此小组的领导人。

本书是他的精彩工作回顾，详述此一小组的运作方式，

并列举多位最危险的重犯的侦查记录。

著名的电影《沉默的羔羊》

即根据其中一个案例改编而成。

本书在美国及日本畅销许久。

ISBN 7-221-03444-3



9 787221 034441 >

ISBN 7-221-03444-3/1 · 599

定价：17.80元





1976年12月16日自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第107期结业。由左至右：我、潘蜜、联邦调查局局长克拉伦斯·凯利、我母亲、我父亲。



1982年因亚特兰大杀童案而受审的韦恩·威廉，当时我建议助理检察官桀克·马拉得采用一种策略，暴露出威廉想要隐藏的人格。



阿拉斯加州安克拉治市的烘焙师
罗伯特·汉森。
此人先是猎捕野兽，逐渐变为猎捕当地妓女，方是先绑架，然后放她们在森林中，再加以猎杀。

被判杀害夏丽·费依·史密斯及黛博拉·海米克的赖瑞·吉恩·贝尔。当我在莱克辛顿群警长吉姆·麦特办公室侦讯他时，他否认“坐在这里的”赖瑞·吉恩·贝尔犯下这种罪，但却承认“那个坏赖瑞·吉恩·贝尔”有可能犯罪。





典型的案情咨询会议。葛雷格·麦奎利向调查支援组的同僚说明纽约州罗撒斯特市连续杀害妓女案的细节。这项调查及麦奎利的防制策略帮助警方发现并逮捕凶嫌亚瑟·萧克罗斯，此人后因十项杀人罪受审、判刑。自左至右：吉姆·瑞特、葛雷格·麦奎利、我，史蒂夫·埃特。



为调查支援组新进成员筹划训练计划时，我们常获得一些杰出的法律及执法组织的大力协助。此处我和桀德·雷正要致赠感谢匾额纽约警局犯罪现场组的指挥官唐纳·史蒂文生，感谢该单位协助我们人员现场的训练。

THE Journal

Fairfax County's daily newspaper

July 18, 1988

WEDNESDAY

43¢

Police profile Rosie's killer

Say suspect is nervous, now laying low

By ADRIAN HIGGINS

The serial killer, British-born John Douglas, is a dangerous, violent, "crazy" who is just now trying to catch up with his life, says FBI agents.

The slaying of the 10-year-old last month was a tragedy, FBI agents said. The slaying was a tragedy, FBI agents said. The slaying was a tragedy, FBI agents said.

The slaying was a tragedy, FBI agents said. The slaying was a tragedy, FBI agents said. The slaying was a tragedy, FBI agents said. The slaying was a tragedy, FBI agents said.

Profile of a killer



Profile of a killer

John Douglas, 37, is a former FBI agent who is now a private investigator. He is a former FBI agent who is now a private investigator.

- He is a former FBI agent who is now a private investigator.
- He is a former FBI agent who is now a private investigator.
- He is a former FBI agent who is now a private investigator.
- He is a former FBI agent who is now a private investigator.
- He is a former FBI agent who is now a private investigator.
- He is a former FBI agent who is now a private investigator.
- He is a former FBI agent who is now a private investigator.
- He is a former FBI agent who is now a private investigator.



FBI Special Agent John Douglas describes Rosie Gordon's killer. At left are tattoo and composite drawing.

防制技巧之一例。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中，当我们完成侧写后，多半会透过当地媒体将之公开，希望有人能认出符合此描述的人，并且通知警方。

目 录

序 曲	我一定是在地狱	1
第一章	凶手内心	11
第二章	我的母亲叫福尔摩斯	22
第三章	雨滴也可以赌	38
第四章	两个世界之间	52
第五章	是行为科学,还是狗尿?	69
第六章	好戏上路	81
第七章	黑暗之心	103
第八章	凶手有说话障碍	127
第九章	设身处地	147
第十章	人皆有弱点	161
第十一章	亚特兰大	176
第十二章	我们的伙伴	201
第十三章	最危险的游戏	213
第十四章	谁杀了美国甜姐儿	232
第十五章	伤害心爱的人	252
第十六章	“上帝要你和夏丽·费依作伴”	265
第十七章	谁都可能是受害人	286
第十八章	心理医师的战争	305
第十九章	有时候魔龙会战胜	328

序曲 我一定是在地狱

我一定是在地狱。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我被绑住、全身一丝不挂。身上痛苦难以忍受。某种利刃正撕裂我的手臂和双腿。全身每个毛细孔都被侵入。喉咙被东西卡住，说不出话。尖器插进我的阴茎和直肠，整个人好像四分五裂。我汗如雨下。然后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在我职业生涯中被我送进牢里的杀人犯、强暴犯、儿童猥亵犯正打算把我折磨至死。这时候受害人变成了我，而我却无法反击。

我清楚这些家伙怎么作案，我看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他们都有操纵、支配受害人的需求。他们希望能够决定受害人的生死或是如何死法。他们会折磨我到承受不住为止，我若昏过去或奄奄一息，他们会再把我弄醒，总之就是竭尽所能让我痛不欲生。这种人中有些可以乐此不疲好几天。

他们要让我知道他们完全处于上风，我则是任凭宰割。我越是大叫、越是哀求手下留情，越是助长他们邪恶的幻想。我若是求他们饶了我、让步或是呼爹叫娘，他们更是变本加厉。

这就是我六年来追捕万恶不赦之人的回报。

我的心跳加速、筋疲力尽。他们把尖器插入我的阴茎深处，我感到痛彻心肺的一刺。整个人痛苦得痉挛起来。

上帝，求求你，我若没死，请让我快点死吧。我若已死，就快点让我离开这苦难地狱。

接着,我看到一道光,就像听人说的垂死者会看到的白色强光。我以为会看到耶稣、天使或是魔鬼,这种说法我也听过。不过我只看到明亮的白光。

然而我确实听到声音,一种令人宽慰、让恐惧消失的声音。这是我听过最祥和的声音。

“约翰,别担心。我们会尽力救你的。”

这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约翰,你听得见我说话吗?别担心。别紧张。你已经在医院了。你伤势很重,我们会尽力救你。”这是当时护士对我说的话。她不知道我能不能听得见,但是以安慰的口气再三重复着。

当时我在西雅图的“瑞典医院”,没有意识,只靠生命维持系统撑着。我的双臂和双腿被系住,身上插满管子、静脉内线。没有人认为我还能活下去。当时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三十八岁。

故事要从三星期以前说起,当时我在美国另一头的纽约,正对纽约警署、捷运交通警察、长岛纳萨苏佛克郡(Nassau and Suffolk)警察部门共约三百五十名人员演讲犯罪个性侧写(profile)(译注:从犯罪形态以及被害人特性等方面搜集、归纳出凶手特征或人格特性之犯罪调查技巧)。这主题我已讲了几百次,都能倒背如流。

突然我开始心不在焉。我知道自己还在演讲,但却全身冒冷汗,我自言自语:我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些案件?当时我刚办完亚特兰大韦恩·威廉(Wayne Williams)杀害小孩案以及水牛城“点二二口径手枪”种族谋杀案。在此之前我还参与了旧金山“林径杀手案”(Trailside Killer)的调查工作。我曾担任英国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的顾问,与英国警方共商“约克夏开膛手”(Yorkshire Ripper)案的侦查事宜。我也为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en)案件往返阿拉斯加。罗伯特·汉森是安拉治(Anchorage)的面包师父,专挑妓女下手,将妓女载往荒野,再加以杀害。我也办过连续纵火犯的案

件,这位仁兄专挑康乃狄克州哈特弗德(Hartford)一地的犹太教堂下手。隔周我又必须飞往西雅图,为“绿河小组”(The Green River Task Force)提供意见。这小组正在调查可能是美国史上犯罪情节最重的连续的杀人案,凶手专挑西雅图至塔科玛(Tacoma)带的妓女和路过人士下手。

在此之前六年,我一直在研究新的犯罪分析方法,我是“行为科学组”(Behavioral Science Unit)唯一的专职办案人员。小组其他人员多是讲师。当时我手边有一百五十多件未破案件要独力处理,一年有一百二十五天在外奔波,没有待在维吉尼亚州匡提科(Quantico)“联邦调查局学院”的办公室。我感受到来自地方警察的庞大压力,这些警察自己也承受社区、受害者家属要求破案的庞大压力,我非常能体会这些受害家属的感受。我一直想要分出工作的轻重缓急,但是每天都有新案件不断涌入。匡提科的助手常说我像男妓,因为无法拒绝客户。

在纽约演讲时,我不断谈到犯罪个性类型,但思绪却飘移到西雅图。我知道这小组中有些人并不服我,这也是预料中之事。一如每次发生重大案件,我常奉命提供大部分警察和许多联邦调查局官员认为与巫术无异的新型办案方式,这回我知道我必须又要自我“推销”。我必须具说服力,同时又不能显得过于自满或自大。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认为他们的调查已经相当完整、专业,同时我也要使心存疑虑的人士相信联邦调查局的确能帮上忙。不过令人相当沮丧的是,不像传统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只要锁住事实就行了,我的工作还牵涉到处理意见。我非常清楚,只要我出了差错,调查方向可能就差之千里,导致更多人遇害。更惨的是,这会让我努力要付诸实行的罪犯侧写和犯罪分析的新计划泡汤。

还有四处奔波的问题。我去过阿拉斯加几次,经过四个时区,再搭飞机贴近水面低飞,险象环生,好不容易在一片漆黑中降落,却几乎是一下机和当地警察碰面后立刻又飞回西雅图。

这种无缘无故的焦虑持续大概一分钟。我一直对自己说：嘿！道格拉斯，振作点。控制一下自己。情形才好些。我想屋内没有人知道情况有些不对劲，可是我就是挥不去悲剧即将发生的感觉。

这种不祥的预感始终不去，回到匡提科后，我到人事室拿出保障残废的附加寿险和收入保险。我说不出个中原因，就是有种模糊但深刻的恐惧感。我疲乏不堪，消耗太多体力；为了消除压力，酒也喝过量了。我很难入睡，真睡着了也常被寻求紧急援助的电话吵醒。再回去睡以后，常会逼自己去做与案件相关的梦，期待能找出蛛丝马迹。现在回想起来，不难看出我后来会发生什么事，但当时就是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前往机场前，我去了一趟我太太潘蜜(Pam)任教的小学，她教导有学习障碍的学生阅读。我告诉她有关额外险的事。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她担心地问我。我头部右侧疼得非常厉害，她说我双眼满布血丝、表情怪异。

“我只是想在离开前把每件事都告诉你。”我这样回答她。当时我们有两个女儿爱丽卡(Erika)八岁，罗兰(Lauren)三岁。

此趟西雅图之行，我带了布雷恩·麦韦恩(Blaine McIlwain)和隆·沃克(Ron Walker)这两名新来的特别探员参与侦办案件。当天晚上到达西雅图后，我们住进市中心的希尔顿饭店。整理行李时我发现黑皮鞋只有一只。要不是少带了一只黑鞋，就是在途中掉了一只。隔天早上我将在国王郡(King County)警局演讲，没有黑鞋肯定不行。我一向很注重外表，因此即使感到疲惫和压力，仍然一心惦记着要有黑鞋搭配西装，于是到市中心到处找，最后终于找到一家仍在营业的鞋店，买了一双黑鞋疲惫不堪地回到饭店。

隔天——也就是星期三——的上午，我向警察和一个小组演讲，这小组包括西雅图港的代表和两名参与协助调查的当地心理医师。对于我对凶手的侧写、凶手是否不只一个，以及凶手可能是什么样的人的说明，他们都很感兴趣。我努力要让他们知道的一点

是,在这一类的案件中,侧写并非那么重要。我相当肯定凶手会是哪种人,当然也知道随便就会有一堆人符合我的描述。

在这不断的谋杀案环节中,我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事是要能够**防制**(proactive),结合警方的努力和媒体的影响力来引凶手入网。例如我建议警方可以举办一系列的社区座谈来“讨论”犯罪。我有把握凶手会出现在座谈会中。我也认为这有助于找出有几位凶手。另一种我要警方尝试的策略,是对媒体宣布有人目睹其中一宗绑架案。我想这会促使凶手采取他的“防制策略”,现身去了解为何他会在附近被撞见。我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是,不管凶手是谁,谋杀事件将不会停止。

接着我告诉小组如何侦讯可能涉案的凶嫌,包括警方逮捕的人或一些重大案件免不了会引来自称是凶手的怪人。演讲完后,麦韦恩、沃克和我看了多处弃尸地点。当天晚上我们回到旅馆时,已经筋疲力尽。

我们在旅馆的酒吧喝酒松弛一下,我告诉布雷恩和隆身体不大舒服。我的头依旧很痛,可能是感冒了。我要他们隔天替我代劳。我想如果第二天在床上休息一整天,可能会觉得好些,于是互道晚安后我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告诉这两个同事星期五早晨再与他们会合。

现在我只记得当时觉得很不舒服,坐在床边开始宽衣。两位探员同事星期四回国王郡政府大楼,接着叙述我前天所提的纲要。他们应我的要求,让我好好休息了一天。

不过星期五早上我并没有去吃早餐,他们开始担心了;他们打电话到我房间,没人接听电话。他们来到房前敲门,没有反应。

他们紧张了,于是去柜台向服务人员要钥匙,回到楼上开了门,却发现上了锁链。但他们听到屋内传来微弱的呻吟声。

他们踢开门冲进去,发现我像青蛙般的趴在地上,衣衫不整,看得出想要接近电话。我身体在半边正痉挛着,布雷恩说当时我

“全身滚烫”。

旅馆打电话给“瑞典医院”，医院随即派来一辆救护车。同时布雷恩和隆守在电话旁与急诊室联络，告诉他们我的生命迹象。我的体温是四一点六度，脉搏二二〇，左半边身体瘫痪；在救护车上不断抽搐。医学报告上形容我是“娃娃眼”——睁大、呆滞、茫然。

一到医院，院方马上替我冰敷、静脉注射大量的镇静剂“苯巴比妥鲁米那”(phenobarbital)，期望能控制我的抽搐。医生告诉布雷恩和隆，他替我注射的镇静剂量足以让整个西雅图居民入眠。

医生也告诉他们说，大家都很努力救我，但我可能还是活不了。断层扫描显示我的右脑因发高烧而破裂、出血。

“用外行人的话来说，”医生告诉他们：“他的脑已经炸成脆片。”

当时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日。我的新保险正巧在前一天开始生效。

我的小组组长罗杰·戴普(Roger Depue)到潘蜜的学校当面告诉她这项消息。然后潘蜜和我父亲杰克飞到西雅图来陪我，两个女儿则留给我母亲朵乐丝(Dolores)照顾。联邦调查局西雅图调查站的两名探员里克·马瑟思(Rick Mathers)和约翰·拜纳(John Biner)到机场接他们，直接来医院。此时他们才知道情形有多严重。医生要潘蜜有心理准备，我可能活不了，即使不死也可能失明或变成植物人。信仰天主教的潘蜜请来神父为我行临终圣礼，但是神父发现我是长老派教徒，不愿替我施行仪式。布雷恩和隆通过他找到另一位没有这些顾虑的神父来为我祷告。

整个星期我一直昏迷不醒，周旋于生死一线间。加护病房规定只有家人可以探望。因此我匡提科的同事、里克·马瑟思、西雅图调查站的人员突然都成为我的亲戚。“你的家人还真多。”有位护士这样向潘蜜开玩笑。

“大家庭”并非全是玩笑。在匡提科，“行为科学小组”的比尔·哈格玛伊尔(Bill Hagnaier)以及“国家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的汤姆·哥伦贝尔(Tom Columbello)和计多同事发起募捐活动，筹钱让潘蜜和父亲能留在西雅图陪我，不久他们便收到全美各地警察的捐款。另一方面他们也安排将我运回维吉尼亚州，以便安葬于匡提科的军人公墓。

事发一周后，潘蜜、我父亲、探员们和神父在我床边围成圈、手牵手、握住我的手为我祷告。当天深夜我恢复清醒。

我记得当时很惊讶看到潘蜜和父亲，也搞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刚开始我无法言语，左脸扭曲，身体左半边严重瘫痪。语言能力恢复后，起初说的话也是含糊不清。过了一阵子，腿才能动，能做的动作渐渐多起来。我的喉咙因为插入生命维持管而疼痛无比。控制抽搐的药也从“苯巴比妥鲁米那”换成“大仑丁”(Dilantin)。经过一连串的检测、扫描、脊椎穿刺，医生终于作出临床诊断：因压力和日益衰弱的体力所导致或并发的病毒性脑炎。很幸运地，我保住了一条命。

但是复原情况很痛苦，进展缓慢。我必须重新学习走路，记忆也有问题。为了帮助我记住主治医师的名字“西格尔”(Siegal)，潘蜜拿来一个立在软木基座、用贝壳做成的海鸥小雕像(译注：因“海鸥”的英文发音与“西格尔”相同)。后来董师来测试我的心智，问我是否知道他的名字，我含糊不清的说：“当然知道，‘海鸥’(Seagull)医师。”

尽管周遭众人热诚支持，我对于复健的进展却是相当沮丧。在此之前我从来不能忍受坐着没事干或做事慢吞吞。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打电话来为我打气。我告诉他说自己大概从此无法拿枪射击了。

“约翰，别担心，”局长安慰我，“我们要的是你的头脑。”我没说的是，怕的是心智也所剩无几了。

终于我出院了，圣诞节前两天我回到家中。出院前我送给急诊室和加护中心医护人员匾额，表示我对他们救命之恩的感激。

罗杰·戴普到杜勒劳动保护机场(Dulles Airport)接我们，开车载我们回到弗雷德立克堡(Fredericksburg)的家，门前飘着一面美国国旗和“欢迎约翰回家”的牌子。我的体重由八十九公斤磅降到七十二公斤。我的模样和必须靠轮椅行动的事实，让爱丽卡和罗兰两个孩子非常难过，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每次我要出门，他们都会非常害怕。

这一年的圣诞节非常凄凉。除了隆·沃克·布雷恩、比尔·哈格玛伊尔和匡提科探员吉姆·霍恩(Jim Horn)之外，我没看到多少朋友。我已经可以不靠轮椅，但四处走动依旧不易。此外，跟人交谈也有困难。我发现自己动不动就哭，记忆力也不可靠。每回潘蜜或父亲开车载我绕弗雷德立克堡，我会注意到某栋建筑物，但不知道那是否是新盖的。我觉得自己像是中风病人，不知道还能否工作。

我以联邦调查局让我落得这般下场也深感愤愤不平。在前一年二月，我同副局长吉姆·麦肯基(Jim McKenzie)说过。我告诉自己进度落后，问他是否能加派人手。

麦肯基虽然同情我却也很现实。“这个机构你也知道，”他对我这样说：“在别人肯定你的工作前，你就得一直做，做到倒下为止。”

我不只觉得不受支持，同时也觉得自己的努力别人并不领情，相反的还吃力不讨好。在此前一年，我办完亚特兰大的“杀害儿童案”后，却遭到局里正式申诫，理由是因为韦恩·威廉被逮捕后维吉尼亚州《新港报》(Newport News)刊登的一篇报导。记者问我对威廉涉案程度的看法，我回答说他看起来很可能涉案，如果凶手真是他，那他可能涉及好几件案子。

当时是联邦调查局叫我去接受访问的，但他们却说我对未破

案件发表不当言论,又说在我接受《时人》(*People*)杂志访问前几个月已经警告过我。这是典型的官僚作风。结果我被送交华盛顿总部的“专业职责处”(the Offic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究办。经过六个月官僚作业后,我收到一份申诫书。后来我又因这案件拿到一张表扬奖状。这是局里肯定我协助侦破这媒体称为“世纪罪行”的努力。

执法人员的辛酸也难与人说,甚至无法同配偶讨论。当你看了一整天的尸体和截肢,如何能把这话题带回家?尤其当死者是小孩时更是不堪。你无法在吃饭时说:“我今天办了一件强暴谋杀案。我把案件情节说给你们听听。”这也是为何警察常会娶护士或护士常会嫁给警察的原因,这样他们才能体会彼此的工作。

我时常会到公园或林子里,有时是带女儿散步,这时我看到什么景物就会想:这里很像我们找到那个八岁孩子的被害现场。不过,虽然我担心孩子们的安危,但对小孩的擦撞伤却不会看得很严重。有时回到家,潘蜜告诉我女儿从脚踏车上摔下缝了多少针,我马上会想到那个同年龄孩子的尸体被解剖的情形,以及法医缝补死者伤口以便下葬的画面。

潘蜜的朋友多半热衷地方政治,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兴趣。由于我常在外奔波,照顾小孩、家计、持家的责任最后就由她一肩挑。这是我们婚姻的诸多问题之一,我也知道至少大女儿爱丽卡感觉出这层紧张关系。

我为自己的际遇一直怨恨联邦调查局。回家一个月后,有一天我在后院烧树叶,一阵冲动下,进门拿出家中所有的档案资料和我写的文章,全都丢进火里。解决掉这些东西以后,我感到发泄的舒畅。

过了几周,我能开车了,便到匡提科的国家公墓去看原本是我的墓地。墓位是按照死亡日期排列,假若我真死于十二月一日或二日的话,我排到的墓位可真不好。我注意到墓位恰巧与一位小

女孩的墓为邻，她在离我家不远的车道被人刺死。这案子我办过，凶手至今依旧逍遥法外。站在那里沉思之际，我回想到有好多次建议警方监视凶手可能会去的墓地，假若现在警方正在附近监视，会不会把我当嫌疑犯抓起来？想到这里不禁觉得讽刺。

在西雅图发病四个月，我依旧还在病假中，双腿和肺因为并发症和经常卧病在床而出现血块，每天都过得很痛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工作，就算能再上班，是否还有信心。这一段时间，“行为科学小组”教学部的洛伊·哈兹伍德(Roy Hazewood)工作量加倍，我手边的案件全由他接手。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首次重返匡提科，向调查局各调查站五十多名在职侧写员演讲。我踏进教室——因为血块使双脚依旧浮肿，我只能穿拖鞋出门——这些来自全美的探员起立为我鼓掌。这个反应是自发而又真诚的，因为他们最能了解我的工作和我努力想在局里进行什么样的创局。好几个月来，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受到珍惜、感激，仿佛回到家一样。

一个月后我又回到工作岗位上。